

胡適與李大釗

(上)

(本文插圖刊第37、38、39、40、41頁)

●黃艾仁(大陸作家)

結交初期互有共識

長期以來，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密切交往的史實，早已為歷史的灰塵所蒙蓋，或為一些人摘其所需，加以剪裁，以致其中真情實況，是非曲直，久為人們所茫然。為了「讓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有利於現代史的研究，有助於對歷史人物作出科學的評價，筆者冒昧地把塵封着的問題亮了出來，以期大家探討。

胡適與李大釗的交往，嚴格地說是起於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胡李同時進入編委會才開始的。同年二月，李大釗受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時，胡適在社會上，不僅因竭力提倡白話文而頗孚聲望，而且是擔任了英文學、英文修辭學、中國古代哲學三種教學的北大教授。顯然，無論是《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或北大的教學工作，他們之間都要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繫與接觸，促進了彼此之間的溝通與瞭解。事實說明，在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至「五四」運動，他們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走向上，在對待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態度

上，他們都有了較一致的共識。

(一)在對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評估上：這是研究胡適或李大釗早期思想發展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然而有人却出於拔高李大釗思想發展起點的考慮或為了沖淡胡適早期對民主政治的正當要求的表述。因此，在評論李大釗或胡適思想發展脈絡時，對此往往不是輕描淡寫就是避而不談。深怕混淆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胡適或李大釗，他們的態度是明朗的，觀點是一致的。無可諱言，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究其因乃在於它推翻了殘酷的沙皇統治，解放了千千萬萬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雖然這次革命有它的局限性，但它畢竟是為實現民主政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因此當時李大釗得到這一消息後，便立即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甲寅》雜誌上，發表了題為《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熱情洋溢地認為這次革命是一齣「痛快淋漓之活劇」，其「影響所及於吾國並世界之政治前途，關係絕非淺鮮」。他說，它不僅「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而

且是「間接以灌溉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者宿，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為此，他向我國廣大人民呼籲，應以這次俄國革命之影響，「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可見，李大釗對這次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予以充分肯定的。此時，胡適雖遠在美國，未與李大釗見面，也不像李大釗那樣在日本留學時就開始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但由於在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在嚮往民主自由上的一致性，所以幾乎在同一時間，胡適在美國也不約而同的發生熱烈的反應，飽含激情地作了《沁園春》一詞，為俄國這次革命「去獨夫『沙』，張自由『幟』」而拍手高歌，情不自禁地歡呼「新俄萬歲！」並且公開發表在《新青年》三卷四號上。毫無疑問，這是適乎時代潮流，順乎民意民心的。說明歷史發展的趨向，啓迪他們作了深刻的思索，作出了科學的理性的判斷：唯有首先剷除封建專制統治，清除封建污穢，才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歷史表明，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新文化運動之初，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雖不

是徹底醫治中國命運的靈丹妙藥，却是喚醒中國人民起來轟毀封建反動統治的有力思想武器。因此，無論是李大釗或胡適，當時他們所展示的政治追求，既是與歷史發展進程相一致，也是體現廣大人民要求擺脫反動統治的願望。這是無可厚非，值得肯定的。

反禮教不是反孔子

(一)在對待孔子與孔教的評判態度上：衆所周知，新文化運動是我國歷史上一場空前的啓蒙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要啓蒙、要思想解放，必然要批判二十多年來爲封建統治者所宣教的孔孟之道。正如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所指出的：「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很明顯，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體系不倒，不把張掛孔教招牌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清除掉，民主自由的意識就不能得到發展，思想解放的要求就不能實現。出於這種強烈的願望與迫切的要求，在摧枯拉朽的浪潮中，難免出現一種過激的情緒與極左的態度。因而，不加分析的把孔子其人及其學說置於絕對否定的地位的形而上學的批判方法，也就應運而生。

這是先驅者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有違先驅者之初衷的。事實說明，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李大釗在《甲寅》雜誌上發表題爲《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中，就明確地指出：「余之抨擊孔

子，非抨擊孔子之本身，乃抨擊孔子爲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抨擊孔子，乃抨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很清楚，這段話是針對當時反孔浪潮中所出現的偏頗而說的，是有的放矢的。其後，胡適爲《吳虞文錄》作序，誇獎了吳虞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因而，有人爲此發生誤解，認爲胡適也是個激進分子，說他是過激派。其實，這是不符合胡適思想實際的。細讀胡適的序文，我們便不難瞭解他所特指的「孔家店」乃是指「掛着孔丘招牌」的「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並非泛指孔子學說。對此，胡適事後曾多次作了解釋。他說：「關於孔家店，我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的抹煞」。直至晚年，他在向唐德剛教授口述自傳時，還反覆地申明說：「有許多我認爲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從這裏可以看出，在對待孔子其人及其學說的認識上，胡適與李大釗所持的態度是基本一致的。說明了他們對孔孟學說的評估與當時一般激進者所持的絕對排斥的態度是不同的。說明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作過一番認真研究的與審慎的抉擇。

(二)在對婦女解放的認識上：婦女解放問題，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它直接與封建、反禮教的目標聯繫在一起。正如李大釗所說：「我們若想真正的 Democracy 在中國的社會就能够實現，必須先作婦女解放的運動」，「我

們要是要求兩性間的 Democracy，這婦女解放的運動，也比什麼都要緊」。所以，胡適回國後所大力宣傳的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以及先後發表的《易卜生主義》、《貞節問題》等推動婦女解放的文章，顯然是李大釗所首肯的。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八年九月胡適應邀到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作題爲《美國的婦人》的講演。在講演之前，胡適曾把長達萬言的講稿交給李大釗審閱。李大釗閱後，極爲贊賞，要求胡適的講稿在《新青年》刊載之前，先在他主持的《言治》季刊上發表。胡適對此當然同意。李大釗爲了鄭重起見，發表時還在該文末後，寫了一篇短跋。跋中說：「適之先生這篇演講稿寫成，持以示我，謂將寄登某雜誌。我讀之，愛不忍釋。因爾之適之先生，在本誌發表。我的意思，以爲第一可以擴充通俗文學的範圍；第二可以引起國人對於世界婦女運動的興味；第三可以爲本誌開一名家講壇的先例，爲本誌創一新紀元」。

從以上三點的評價中，不難看出當時李大釗對胡適是極其器重的。表明了他不僅贊同胡適解放婦女的觀點，而且把該講稿視爲一篇名家所作的「通俗文學」，稱譽它能在該刊上發表是「創一新紀元」的盛舉。這種並非一般的高度評價，對於「誠實、謙和、不多說話」（魯迅語）的李大釗來說，可謂是慎重其事，發自內心的。說明胡適在該講稿中所反覆申述的「男女不應有內外的區別」，而應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的思想，是與李大釗所熱切追求實現的「解放的時代」、「解放的文明」的願望相一致的。

這就是李大釗與胡適在婦女解放問題上的共識點。不同的是，胡適認為謀求婦女的解放，出路全靠婦女是否能够與男人一樣享受同樣的教育。至於如何使中國婦女爭得受教育的權利，當時胡適與李大釗都沒有作出明確論述。直至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釗在《戰後之婦女問題》一文中，才從階級關係的分析中去找解決的途徑。他說：「我以為婦女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說明此時李大釗已不為一般民主主義的要求所局限，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寶庫中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社會革命論。當然，這是胡適所不能認識到的。但是由於當時社會處於啓蒙的階段，他們之間的共識點是起聯結的主導作用的。

漸進激進互不排斥

（四）在對社會改革步驟的認識上：大家知道，胡適是主張通過一點一滴的改良而達到對社會的改革。因此，他反對以暴力革命來推翻反動政權，而是通過合法鬥爭來限制、改造反動政權，以至通過議會的大多數來奪取政權。歷史的事實說明，企圖以這種西方議會制度為模式的改革藍圖，對於幾千年所形成的中國封建反動政權來說，純屬是一種幼稚的幻想。但是，在五卅時期，這種從西方引進而來的改良思想，却普遍的存在於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的言行中。早在一九一七年，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所發表的《真理之權

威》一文中就這麼說過：「余雖為急進之言論，余並不排斥漸進之言論，蓋言論而發於良知之所信，無論其為急進為漸進，皆能引於進步之境，而達於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權威，張言論之權威，以言論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願與並世明達共勉之矣」。可見，當時李大釗對於改良的言論、改良的思想，並不是持一概否定的態度，而是認為可與急進言論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因為無論是急進或漸進，都是有利於推動社會的前進，有利於對真理的追求。所以，當時他對胡適所大力宣傳的改良主張，不僅沒有加以排斥，而是與之携手同行。對此，有人感到疑惑。實際上，早在三十年代，王森然在《李大釗的評傳》中就明確指出：「先生最初與胡適之等同執漸進主義；乃不久即行過激化」。這與我們在上文所引述的看法相一致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作為當時思想革命先驅的陳獨秀，其漸進主義思想的表現尤為突出。他在《新青年》八卷四號上所發表的《主義與努力》一文中，就作過這樣的表白：「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無論在何種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社會就會從天上落下來」。可見，這種漸進主義的改良思想，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如果說，這是由於胡適大力宣傳的結果，那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無論是陳獨秀

或李大釗，他們都受過西方思潮深刻的影響，在馬列主義還沒有得到廣泛傳播的年代，在革命勢力還不可能與反動勢力相抗衡的年代，他們以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作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思想武器，是情有可原的。

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導師、革命理論的權威列寧，在他一九二一年所寫的《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一文中，不僅沒有否認「改良行動」，相反的，恰恰是以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為例來說明「改良行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批判那些頭腦不清醒的人，「往往會遭到失敗的懲罰」。他說：「對於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誇大革命性，忘記適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開始用大寫字母開頭寫『革命』二字，把『革命』，奉為幾乎是神聖的東西，喪失理智，不能最冷靜最清醒地考慮、權衡和檢查一下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什麼場合採取革命行動，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什麼場合轉而採取改良主義的行動，那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頭破血流」。其後，他又補充說：「改良行動通常是緩慢地、審慎地、逐漸地前進，而不是倒退」。所以，如果我們不加分析地一味指責李大釗或陳獨秀對於改良主義的論述是欠妥的。實踐證明，新文化運動初期，無論是李大釗或陳獨秀，他們之所以能與胡適聯袂而行，正是由於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他們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改良的思想。否則，廣泛的民主統

一戰線勢必難以形成。事實說明，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不僅沒有削弱當時的革命力量，而是有助於團結更多的有識之士投入到革命潮流中去。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的友誼，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一致維護學生運動

大家知道，五四運動是現代史上一次以知識分子為先導，以文化啓蒙和思想革命為前奏的偉大的愛國運動，它的產生是與新文化運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無論是李大釗或胡適，對於這次運動所起的直接或間接的作用，我們必須給予歷史的分析與充分的肯定。一九五〇年金毓黻教授在《新觀察》六卷十三期上發表了題為《李大釗與五四運動》一文，列舉了大量的事實，印證了李大釗在這次運動中是起了領導作用的。這裏已無須再贅言。至於胡適，雖然運動發生之時，他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迎接杜威來華。但是從胡適當時最親近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的言行看，以及胡適對這次運動所發表的言論進行考察，可以看出，他在總的方向上，是維護學生運動的。

當時社會上的保守勢力，曾製造一種謬論，認為「五四運動」是學生「干政的運動」，「做大學教授的人不應該這樣鼓勵學生的運動」。對此，胡適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的《晨報》上，發表題為《我們對學生的希望》的紀念文章中，針對這種謬論予以明確的回駁。他說：「如果社會國家的行為沒有受學生干涉糾正的必要，如果

學生能享安心求學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強烈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責，他們又何必甘心拋了寶貴的光陰、冒着生命的危險，來做這種學生運動呢？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家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因此，他對這次學生運動作了積極的肯定。直言不諱地指出：「學生運動已發生了，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決不能壓下去的；也決不可把他壓下去」。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胡適又在《晨報》上發表紀念文章，題為《黃梨洲論學生運動》。在該文中，胡適借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學校篇中所說，誇獎學生干預政治的行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現在看來，其言雖有過激偏頗之處，但其維護學生運動的立場却是極其鮮明的！

從這兩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出，胡適不僅是站在學生愛國運動一邊，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而且也表明了他當時對反動軍閥統治的無比憤慨。毫無疑問，這都是與李大釗的觀點相一致的。因此，胡適在當時進步學生中被視之為良師益友，在一些保守分子的眼中斥之為「過激派」，應該說不是沒有原由的。

尚不懂馬克思學說

衆所周知，胡適與李大釗在思想認識上出現了明顯的分歧，是一九一九年七月間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一文而引起的。當時雖然有幾篇爭論文章發表，但範圍不廣，最終由於《每周評論》被反動軍閥封閉，爭論的問題不了了之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爲了歷史而客觀的對這個問題作出公正的判斷，今天我們仍有必要把它置於學術的範圍之中，認真地予以探討：

(一)從當時社會與論界的狀況看：在五四運動浪潮的沖擊下，封建的傳統思想羅網被突破了，與論界的思想異常活躍，從西方引進而來的形形色色思潮到處泛濫，各種各樣的「主義」應運而生，真假難分。正如茅盾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座談會上所說，如「研究系不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是以假社會主義反對真社會主義。他們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企圖魚目混珠，欺騙青年」。所以，當時孫中山曾就此說過：「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哪一種是真的」。

可見，單就社會主義而言，當時也是萬應紛呈，令人眼花撩亂，五花八門。至於無政府主義思潮，其影響的範圍更廣。李新、陳鐵健主編的《偉大的開端》對此曾作了如下的敘述：

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特別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互助進化論」，不僅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廣爲流傳，即使已經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這種思潮的影響。例如，李大釗在談到「少年中國」的理想時，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進化論」放在突出地位，認爲

他「所理想的『少年中國』」，其「精神方面改造的運動，就是本着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墜落的人心」。毛澤東稱贊過克魯泡特金一派的主張，比較馬克思一派，（認為）其「意思更廣、更深遠」。

因此，鄧穎超在回憶六十年前輿論界的狀況時說：「那時是百家爭鳴，各種思潮都有。我們也是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就馬列主義的傳播狀況來說，那也只是剛剛開始。正如直接參加五四運動的許德珩說：「五四運動時雖然有少數人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大多數對馬列主義還是不懂的」，「大多數人只把馬克思主義當成諸子百家，未當成救國良方」。為此，鄧穎超曾作了實事求是的評述，她說：「拿五四運動來說，我看了一些材料，裏面說五四運動是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受馬列主義的影響。說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這符合事實，可以；但說受馬列主義影響，就不完全符合事實。我們許多人參加五四運動時知道十月革命，但還不懂得馬列主義」。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當時多數人對馬列主義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對於胡適來說，當然也不例外，充其量只是把馬列主義視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罷了。因此，如果把胡適的那篇「文章」（即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下同。）說成是自覺的有意識的反對馬列主義，是「向馬克思主義發起的第一次最猖狂、最露骨的進攻」，就其當時的狀況來說，看來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這與當時輿論把胡適視為「過激派」的評價是不相一致的。

以耳當眼妄人太多

〔二〕從胡適「文章」所闡述的內容看：「讀者如果細心的閱讀胡適的文章，便不難發現該文所闡明的主旨是：即反對：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商談某某主義」，反對中國的政客利用某種主義來欺人，反對用抽象的名詞來騙人。如當時安福系首領王揖唐也大談社會主義；如曹錕、盧永祥等軍閥也用「過激主義」來嚇人，以及有些人侈談無政府主義，都是他在該文中作為明確的反對對象。後來藍志先、李大釗提

出批評後，胡適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又作了補充說明。他說：「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裏聽見一個『希爾扎維』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下期續完）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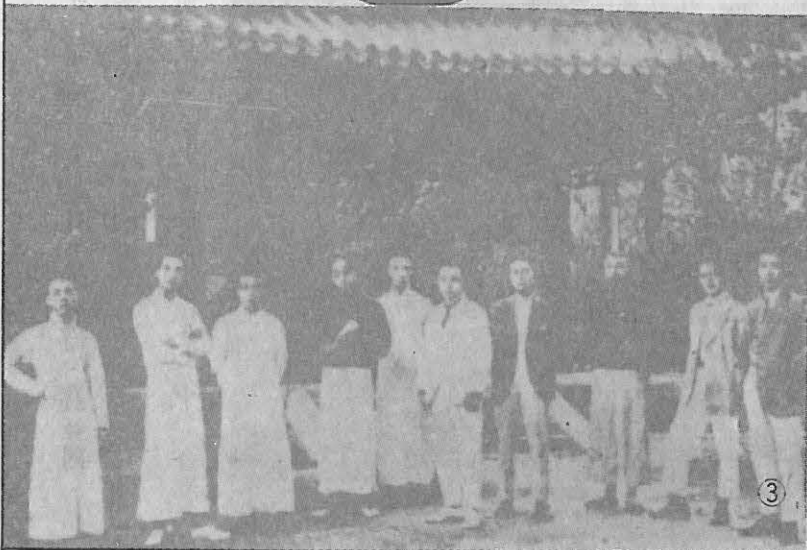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①



②



③

黃艾仁「胡適與李大釗」插圖（文見47頁）

①民國十年李大釗在北平成立馬克斯學說研究會與會員合影。

②在五四期間介紹馬列學說的李大釗。

③民國八年七月李大釗在北平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留影。



①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胡適自美來台，羅家倫、蔣經國、周大中、雷震在松山機場迎接。

②民國四十年胡適（右）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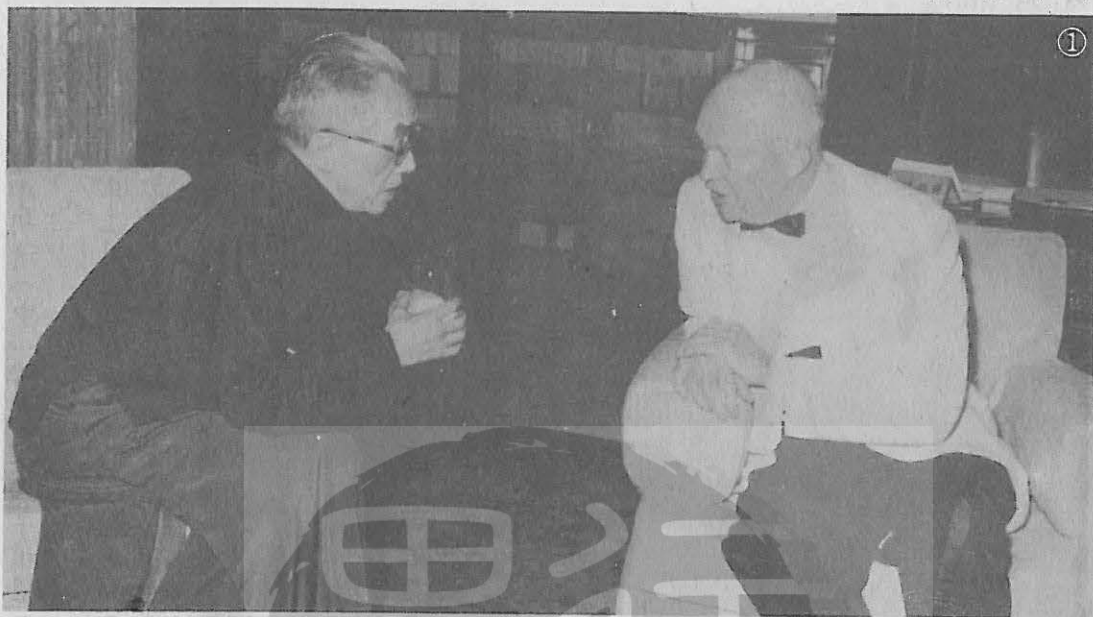


①

①民國廿五年胡適(中)偕夫人與公子祖望(左)、思杜(右)合影。
②民四十三年三月七日胡適(右)、程天放(左)、黃得時(二排左)、董作賓(二排右)出席中國歷史學會時留影。



②



①民國49年胡適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台北圓山飯店會談時留影。

②胡適博士與公子胡祖望、媳曾淑昭、孫胡復合影。





①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胡適在美國加州大學講學時留影。

②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胡適以國大主席團主席身份向蔣中正總統致送當選証書。

